



□王 乐 马云佳

亲仁善邻： 中华民族始终依循的国家理念与格局

自古以来，“邻里好，赛金宝”等亲仁善邻的道德目标和生活方式，是中华民族重视和睦邻里关系、构建良好地缘关系的人际智慧与处世之道的重要体现。“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原出自《左传·隐公六年》。其中，记载郑庄公攻打陈国而获得全胜。在此之前，郑庄公曾主动请求与陈国讲和。陈国国君桓公并没有答应，其第五父劝谏：“亲仁善邻，国之宝也”。意思是说，讲信修睦、亲善睦邻，这是国家应当依循的宝贵理念与格局。邻里、邻邦之间命运与共、守望相助；不同文明之间交流、和平对话，是中华文明赓续至今的核心价值与历史基因，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

与人为善的立场和态度

古人认为能仁爱、尊敬别人之人，亦能受到同样的仁爱与尊重。《论语·季氏》中记载，季氏家臣冉有、子路二人去谒见孔子，告诉孔子说：“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听后，责问冉有为什么要攻打与鲁国共安危存亡的藩属。冉有却认为，颛臾城墙坚固并且离季孙分封地近，要提前将此地占领，以免留下祸害。孔子批评冉有：“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在孔子看来，国家财富平均、境内和平团结，不需武力征伐小国就会招致归服。若不归服，便再修仁义礼乐的政教来使其顺服。自古以来，在这一时段唐朝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有效治理与交往交流交融也是贞观之治必不可少的因素。

流，求学、经商、游历，开展了大量民间往来。万国来朝盛况，正如李白诗中所展现的“四门启兮万国来，考休征兮进贤才。俨若皇居而作固，穷千祀兮悠哉”。而唐朝也做到了“既来之，则安之。”

以和为贵的目标和导向

古往今来，中华民族皆有“和”的精神贯穿其中。“亲仁善邻”思想，充分彰显着“和”的精神，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礼之用，和为贵”，孔子主张为政以和，治理国家、处理事务要以“和”为价值标准。如何能做到“和”呢？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同。”也就是说，“和”的意义并不在于完全相同，和合与共、和而不同，在存有的基础上，有着丰富多彩的“异”相互配合、相辅相成。明代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率领着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远涉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未侵占别国一寸土地，而是带去了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等，并帮助当地调节纠纷、打击海盗，带给世界的是和平与安宁，书写了古代中国与邻邦友好交往的千古佳话。

以和为贵，最重要的是要做到己宽人。《管子》中记载：“明主内行其法度，外行其理义，故邻国亲之，与国信之，有患则邻国忧之，有难则邻国救之。”一个强大而有担当的国家，对内要有严格明确的法律制度，对外邦要施行仁义，邻国才愿意与之亲近，忧患相担、祸患相助。正如孟子所言：“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大国强国当以德行人服人、以道义助人，实行王道政治而非强权霸道，并规定了“行一不义、杀一无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即政治

手段必须服从于和平的目的，而不可滥用。反观当今有些国家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定难行之以久远。

乐群共济的方式和途径

在新时代，“亲仁善邻”尤其体现出中国扶危济困、大国担当的天下情怀。中国从1950年以来，致力于自身发展的同时，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大洋洲和东欧等地区100多个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中国对外援助是中国政府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是中国政府对外工作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履行国际义务的重要内容。援助的目的主要是促进发展中国家自力更生地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主要集中在基本建设工程；发展农业；花费少、见效快的工业项目；社会公共设施；医疗卫生；临时援助。以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的援助为例，中国向150多个国家和13个国际组织提供了抗疫物资援助，为全球抗击疫情贡献着中国智慧和力量。塞尔维亚暴发疫情孤立无援，总统武契奇向中国寻求帮助后，中国毫不犹豫地派遣医疗队、提供大量物资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亲自前来迎接，深情亲吻五星红旗说：“中国来帮助塞尔维亚这个铁哥们，这份恩情，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能忘记。他们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患难之交！”这一幕幕感人至深的场景，彰显着中国的敢于担当与团结友爱。

“亲仁善邻”思想，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源泉。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深入变革，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十字路口，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如提出推动构建新型国

际关系，主动发起并积极实践“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有利于促进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理念主张。中国一贯主张，不同的国家虽然有着不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历史文明和发展水平，但在国际活动中目标一致、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中国主动发起并积极实践“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利于促进人类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一带一路”倡议将使相关国家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中国以大国的担当，为世界各国创造更多的发展机遇，让更多的民众共享美好生活，正是“亲仁善邻”的新时代表达。

“亲仁善邻”，流淌着中华民族独有的内敛与厚重，承载着中华民族特有的宽厚与包容，是中华民族在自强不息和兼收并蓄中所形成的历久弥新的价值观念，更是长治久安、繁盛昌隆的国之宝策。当今时代，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风险挑战亦有新的机遇。在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纪之问时，正需要我们着眼于世界的现实问题，立足于人民的美满幸福，站在人类前途命运的高度，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战、共同责任，用“亲仁善邻”的国家理念与格局，将各国前途命运联系起来，坚持谋和平、共发展，与各国携手同行，创建更加美好的世界，迎接更加光明的未来。



贞观之治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 蒋爱花 张君毅

提起贞观之治，人们脑海中会浮现出一幅在唐太宗李世民统治下出现的政治清明、经济复苏、文化繁荣的治世画面。若问起唐太宗是如何开启贞观之治这一局面的，大家普遍会结合所学知识，给出虚心纳谏、轻徭薄赋、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等答案。实际上，这一时段唐朝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有效治理与交往交流交融也是贞观之治必不可少的因素。

唐太宗用毕生精力统一了东北至辽东、西逾葱岭、北越沙漠、西南到吐蕃的广大地区，开辟了从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往的新局面。唐初在统一各民族地区过程中并非单纯依靠武力征服，而是灵活地采取了招抚、和亲等方式，最终建成了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具体措施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羁縻与藩属制度。“羁”是指用军事手段与政治压力来加以控制，“縻”是指用经济和物质的利益来给予安慰。所谓羁縻制度，含义为在边疆设置羁縻府州等行政单位，任命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担任府州县的长官，从而使得这些边疆民族地区成为唐朝的政区，同时这些地区内部仍保留原有的部落管理模式，并享有较大的自治权。唐代比较有名的羁縻政区有贞观十四年平高昌后设置的安西都护府，贞观二十一年回纥归附后设置的燕然都护府等。

除羁縻制度外，在治理中，唐朝统治者所运用的藩属体制越来越成熟，对于王朝绝对统辖的地方，实行州（郡）县制；对于广大的藩属地区，则由藩臣、舅甥、敌国三种类型的管理方式构成。总之，唐王朝和众多边疆民族的关系分为正州、藩臣、舅甥和敌国四种类型。由于唐王朝的藩属关系处于不断变化中，而“敌国”关系只有在唐王朝初期存在，舅甥关系则仅有吐蕃，因而唐王朝的藩

属管理体制以众多向唐王朝称“藩臣”的边疆民族为管理对象。

羁縻与藩属制度的实行既有效维护了唐朝对边疆民族地区的主权，又减少了管理这些自然环境复杂、交通不便的地区的成本。羁縻府州县中的各族人民在经济方面享有许多优惠，他们的户口往往不登记于版籍，因此可以少纳或免纳租税。对于各民族中遇到困难的人民，唐朝政府也会想方设法予以救助。

和亲、册封与盟誓。唐朝统治者并不排斥与外族缔结婚姻关系，太宗有言：“（和亲公主）亦既生子，则我外孙，不侵中国……边境足得三十年来无事。”据统计，唐立国289年，和亲达20多次。典型的如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太和公主嫁回鹘崇德可汗等，均密切了唐朝与边疆各政权之间的联系，有助于国家边境的和平与安宁。

册封是唐王朝强化与周边少数民族上层集团之间关系的一种重要手段。具体来说，就是承认少数民族统治阶层已有的政治地位，通过举行册封仪式给予他们相应的名号。受册封者成为唐天子之“臣”，要对唐天子效忠并履行一定的义务。贞观二年，太宗为拉拢薛延陀对付颉利，故遣使册拜其酋长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突厥平定后，贞观十三年，太宗令颉利可汗族人李思摩率领颉利旧部还其故地，并将其册为乙弥泥孰俟利苾可汗。

唐代盟誓的对象主要是势力较强的少数民族政权。武德九年，东突厥趁唐朝政局变动，发兵攻至距长安仅40里的泾阳。刚即位不久的唐太宗亲自前往渭水岸边与颉利可汗对话，怒斥后者的背约行为。此事以双方缔结便桥之盟，颉利可汗退兵告终。对唐朝而言，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盟誓虽不一劳永逸之计，但有益于改善王

朝与盟国的紧张关系，为国内社会经济的恢复赢得喘息之机。

优待归附首领及子弟。贞观三年突厥颉利可汗请入朝，太宗即授其右卫大将军，封北平郡王。贞观二十二年契丹酋长窟哥归附，唐廷置松漠都督府，授窟哥以左卫将军兼松漠都督，封无极县男，赐姓李。连常年与唐为敌的颉利可汗在被俘后也得到了优待。他被授予右卫大将军，赐田宅，死后，被赠为归义王，其子嗣爵。归附唐朝的各族首领之族人也普遍获得了唐朝的封赏。如突厥处罗可汗之子阿史那社尔入唐后娶衡阳公主，典屯兵于苑内。铁勒可汗之孙契苾何力，诏宿卫北门，检校屯营事，敕尚临洮县主。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的上层子弟可以迎娶公主，并担任皇帝的亲信宿卫，称得上是备受优待。慷慨包容的唐朝给周边各族首领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中有不少人愿意主动遣子弟入侍，如贞观十五年吐谷浑即遣子弟入侍。

建立海内为一的秩序。唐朝自建立之初便采取开放的政策，鼓励各民族官方与民间的贸易、文化往来。在朝贡贸易方面，各族使臣来朝时会贡献一些当地的特产，以表示“臣礼”，而唐王朝回报的赏赐更是丰厚，价值往往远超贡品。

互市也是唐朝官方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建国之初，饱经战乱的社会需要牛马来恢复生产。贞观时，西域安国贡方物，太宗对安国使者说道：“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充分表现出对西域各国商人到来的欢迎。当时唐朝与各民族的贸易主要是用中原所产的茶叶、丝织品、瓷器等手工艺品换取突厥、回鹘、吐蕃等地的牛马以及西域的宝石、香料和药材等。

伴随着政治经济交流，边疆各民族的文化也不断传入唐朝。贞观时期

的《十部乐》中有一多半为“胡乐”，宫廷的乐工与舞者里也有不少“胡人”。唐朝的建筑、绘画、雕塑艺术也是民族融合的结晶。如唐代著名画家、工程学家，曾绘制《步辇图》，监修翠微宫的阎立本便带有鲜卑血统。与此同时，先进的汉文化也备受其他各民族敬仰。文成公主入藏时为当地带去了多部汉文书籍，随后吐蕃还请求派子弟到长安入国学。可以说，唐朝能创造出辉煌灿烂的文化，离不开其自身对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广泛吸收。正如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所言：“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起，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遂能创空前之世局。”

综上所述，唐王朝以强大的武力和经济实力为后盾，推行了卓有成效的民族政策，顺利把边疆各民族都纳入到大唐的版图之下，维持了“四夷怀服”的多民族国家局面。隋唐时期北方胡汉文化融合，构建起了跨越农耕和草原文明的复合型王朝。唐朝的繁荣是多民族共同书写的中华文化篇章，也是中华大家庭的共同回忆，“统一”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和各族人民共同的心理自觉。

公元7至10世纪，灿烂辉煌的文化之下，边疆民族与中原王朝有着密切的联系，各族人民之间频繁地互动交流，多民族的风俗融合成为人人喜爱的潮流风尚，这是中国古代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阶段性特征。农耕文明的勤劳质朴、崇礼亲仁，草原文明的热烈奔放、勇猛刚健，海洋文明的海纳百川，源源不断地注入中华民族的特质和禀赋。这一时期，多元文化频繁交流、逐渐交融，孕育出了盛唐文明，诗词、书画、歌舞、开放的心态以及源自骨子里的自信均成为后世的典范，中华民族精神亦由世代传承、深化与弘扬。



《植物名实图考》是我国古代植物学名著，作者是清代植物学家、博物学家吴其濬。吴其濬（1789—1847年），字季深，号吉兰，河南固始人，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考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

吴其濬是清代河南省唯一的状元，但他并不看重高官厚禄，而是喜欢探索自然，尤其喜欢观察探究各种植物。道光元年（1821年），吴其濬因父亲病逝而去官回乡守孝，不料服丧期刚满，母亲又不幸去世，于是只得继续居乡，直至道光八年（1828年）服阙。初入官场就丁忧长达八年，这无疑会对仕途产生不利影响，但吴其濬并不在意，而是在家乡购买了一块依山傍水的土地，满怀热情地建起了自己的植物园，取名“东墅”。在这里，吴其濬一边搜集各类文献，考订植物名称；一边栽种蔬菜花草，观察记录它们的生长习性。《植物名实图考》一书的资料准备工作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丁忧期满后，吴其濬回京任职，后又到江西、湖北、湖南、浙江、云南、贵州、福建、山西等地任要职。无论身在何处，吴其濬都未曾放弃对植物的热爱，而“宦迹半天下”的人生经历，也为他的植物研究以及《植物名实图考》的编写提供了良好条件。每到一个新地方，吴其濬都会留心观察身边的各类植物，在处理政事之余，还要亲自带人到野外进行实地考察，采集植物标本，记录植物性状。遇到不熟悉的植物，吴其濬就向当地官员、百姓以及亲朋好友反复请教。此外，他还开辟了试验田，亲自栽种培育植物，以便详细观察植物的成长过程。经过多年的努力，吴其濬积累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和文献资料，在此基础上开始编写《植物名实图考》，历经数年，终成其稿。遗憾的是，书稿尚未刊行，吴其濬就病逝于山西任上。吴其濬去世后，山西巡抚陆应谷有感于吴其濬的执着探索精神，将其遗稿整理并付梓，这部植物学名著才得以问世。

《植物名实图考》的编写参考了《本草纲目》《救荒本草》等前代本草古籍，全书共38卷，分为“谷、蔬、山草、隰草、石草、水草、蔓草、芳草、毒草、群芳、果、木”12大类，共记载植物1700余种。书中所载植物分布于我国19个省，其中产自江西、云南、贵州、湖南等偏远地区的植物数量较多，部分植物因生长环境人迹罕至，为前代本草书籍中所未备。书中对每种植物的名称、产地、形态、颜色、性味、功用、培育方法等进行了叙述，尤其重视对同名异物、异名同物的植物考订。此外，书中还附有1800余幅植物图，以求文图相互参照。《植物名实图考》以古代文献资料为基础，凡前代书籍中已有记录的植物，吴其濬在写作时都会注明文献来源，并以现实中的植物样本为依据，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补充纠正，对于那些经过研究仍旧无法解决的问题，也不轻易下结论，故而该书中存在着一种植物配有数张图片但未加注释，或者只有图片但没有植物名称甚至没有任何文字说明的情况。

《植物名实图考》所取得的成就就是巨大的。首先，该书的植物图绘制精良，大大超出了前代植物绘图水平。吴其濬长期坚持野外实地考察，故而该书的植物图大多是根据植物的原生状态绘制的，部分绘图甚至完整地描绘了植物的根、茎、叶、花、果，从而更加准确地反映了植物的形态。由于书中的植物图绘制精细、形态逼真，清人张绍棠在翻印《本草纲目》时，甚至将原书中近400幅绘图替换成了《植物名实图考》中的绘图。

其次，重视名与实的考证，纠正了前代本草学家的错误。吴其濬编写该书时虽然参考了大量的前代文献资料，但他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并不盲从，而是始终秉持着理性严谨的态度，结合实际反复求证，尤其是在植物的名称与实物是否相符方面花费了大量精力，从而对前代本草学家的诸多错误进行了补正。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将五加科的通脱木与木通科的木通混淆为同一种植物，一并归入了蔓草类，



□王 萍

吴其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了这一问题，并在编写《植物名实图考》时将通脱木从蔓草类中剔除，改归山草类，这一改动在今天看来是十分正确的。

再次，对我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植物名实图考》收录的植物数量之多、分布区域之广超过了历代本草著作，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许多植物学研究工作者在研究植物分类时往往要以该书为参考，除了可以直接依据书中的绘图来鉴别植物的科、属乃至种之外，我国植物分类学中许多科、属、种的中文名也来源于该书，如罗汉松科、小二仙草科、马甲子属、画眉草属、南蛇藤、千斤拔等。

最后，推动了我国传统本草学向药用植物学的分化发展。在《植物名实图考》以前的本草学著作中，对于植物的研究记载偏重于药性的发掘，而《植物名实图考》不仅记载了植物的药物治疗作用，而且对植物的产地、生长习性、培植方法、品种鉴别等也进行了深入研究，从这个角度来看，该书已经进入了药用植物志领域。故而我们可以说，《植物名实图考》为我国传统本草学开启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药用植物学，并为其提供了翔实的参考资料。

《植物名实图考》刊行后，得到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和追捧，该书亦一再重版，除了陆应谷初刻本之外，还有1880年山西潜文书局重印本、1915年云南图书馆重印本、1919年山西官书局重印本、1919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等，一本科学著作反复重印，足见其价值之大、影响之深远。此外，该书在国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深受国外学者推崇。1866—1883年出任俄罗斯驻清朝公使馆医生的著名汉学家埃米尔·布雷特施奈德阅读此书后，对书中的植物绘图之精审赞不绝口，并将此书称为研究中国植物学的首选参考书。1880年前后，《植物名实图考》传入日本，日本著名本草学家伊藤善介评价该书对植物论述的详细精密程度为历代本草书所未有。此后，美国的一些学者如劳弗也对该书十分推崇，并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了该书的内容。

《植物名实图考》问世170多年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植物学家，直到现在，该书仍是我国植物研究工作者的重要参考文献，而书中所反映出的科学精神和治学态度也值得我们借鉴与弘扬。